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CHINA UPDATE BOOK SERIES

深化改革与 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LONG-TERM
GROWTH

DEEPENING REFORM FOR
CHINA'S LONG-TERM GROWTH AND DEVELOPMENT

主
编

宋立刚
〔澳〕郢若素 (Ross Garnaut)
蔡 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U
PRESS

深化改革与 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DEEPENING REFORM FOR
CHINA'S LONG-TERM GROWTH
AND DEVELOPMENT

主 宋立刚
编 [澳] 郢若素 (Ross Garnaut)
蔡 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宋立刚, (澳) 郜若素, 蔡昉
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4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7145 - 7

I. ①深… II. ①宋… ②郜… ③蔡… III. ①中国经济 - 经济
改革 - 研究 ②中国经济 - 经济发展 - 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2368 号

· “中国经济前沿”丛书 ·

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主 编 / 宋立刚 [澳] 郜若素 (Ross Garnaut) 蔡 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林 尧

责任编辑 / 林 尧 于 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99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145 - 7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撰稿人

(按章节写作顺序)

Ross Garnaut: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经济学教授

宋立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负责人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陆旸: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王小鲁: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周伊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rawford 公共政策学院

Son Ngoc Chu: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rawford 公共政策学院

Owen Freestone: 澳大利亚财政部

Dougal Horton: 澳大利亚财政部

冯颖杰: 北京大学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Rod Tyers: 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张莹: 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张永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Frank Jotzo: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rawford 公共政策学院

滕飞: 清华大学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李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王碧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Alexander Ballantyne: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Jonathan Hambur: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Ivan Roberts: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Michelle Wright: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马国南: 国际清算银行

Robert N. McCauley: 国际清算银行

Wing Thye Woo: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孟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院

陈春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rawford 公共政策学院

Harry X. Wu: 日本一桥大学

吴延瑞: 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马宁: 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郭秀梅: 西澳大学商学院经济系

Robin Bordie: 力拓能源集团

Stephen Wilson: 力拓能源集团

Jane Kuang: 力拓能源集团

张海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rawford 公共政策学院

高祥: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

姜慧芹: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

目 录

CONTENTS

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 改革与中国的长期发展 郢若素 (Ross Garnaut) 宋立刚 蔡 昉 / 3
- 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陆 旸 蔡 昉 / 23
- 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王小鲁 周伊晓 / 41
- 国家控制、企业及资源配置 Son Ngoc Chu 宋立刚 / 60
- 中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及内部调整路径
..... Owen Freestone, Dougal Horton / 87
-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的增长前景 冯颖杰 姚 洋 / 108
- 经济改革日程的短期效应 Rod Tyers 张 莹 / 132

低碳增长和气候变化政策

- 绿色发展如何成为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新杠杆 张永生 / 161
- 中国气候与能源政策
——是否走在通往低碳增长的道路上? Frank Jotzo 滕 飞 / 173

金融体系改革

- 中国金融改革最后的战役 黄益平 李 冉 王碧珺 / 193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金融改革 Alexander Ballantyne, Jonathan
Hambur, Ivan Roberts and Michelle Wright / 210

中国和印度的金融开放度：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启示
..... 马国南 Robert N. McCauley / 248

提高中国金融业和全球货币体系的应变能力 Wing Thyee Woo / 267

要素市场改革

中国当前增长方式下的城市化模式与土地制度改革
——典型事实、主要挑战与政策突破 陶 然 / 285

中国劳动力市场紧张局势和未来城镇化挑战 孟 昕 / 318

FDI 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陈春来 / 341

生产力，专利制度和投资法律

中国工业增长源泉分析：1980 ~ 2010 年 Harry X. Wu / 363

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结构变化和生产率差距
..... 吴延瑞 马 宁 郭秀梅 / 383

中国铁路部门的重要性、发展与改革面临的挑战
..... Robin Bordie, Stephen Wilson and Jane Kuang / 405

中国的专利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张海洋 / 432

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律与政策：发展脉络与问题阐释
..... 高 祥 姜慧芹 / 453

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改革与中国的长期发展

郢若素 (Ross Garnaut) 宋立刚 蔡 昉

一 导论

2013 年 7 月，我们出版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新模式》一书。自那以来，旨在创建中国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改革突飞猛进。今年，我们结合新的情况，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增长新模式。中国希望通过转型，实现由中等收入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转变。本书对新模式成功转变和运作所必需的改革给出了定义并进行了探讨，描述了成功之路上的诸多阻拦，分析了未能平稳“跨栏”时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辨析了中国在调结构、促民生进程中的诸多良机。

2013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批准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市场化改革计划。2014 年 3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划了在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四个方面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的政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扩大消费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提高低收入阶层，尤其是农村居民和非熟练城市工人的收入；减轻中国经济增长对本国和全球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以便加快进程，最终实施一种增长新模式。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2011 年间，中国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旧模式，迅速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1978 年时，中国物质匮乏，超过半数的中国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到 2011 年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告别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短缺的年代，过上了小康生活，更好

地享受着现代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

与此同时，在旧的增长模式下，产能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中的很大部分又重新变成投资，成为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新增量。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快速扩大，但实际工资并无相应增长。新增收入过于集中在国家和私营企业家手中，扭曲了收入分配，使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驱动，在 1997 ~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又过于依赖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并由此产生对于能源和金属的需求暴涨，从而对中国和世界的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在 2014 年出版的那本书中，我们曾经在导论一章指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增长旧模式问题重重，需要检讨。自 2005 年前后以来，中国人口转型与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互相交织，劳动力日益稀缺和昂贵。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进入转折期，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增大，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一年左右的经济紧缩也至此结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成为当务之急，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成为优先课题，一些深化改革的措施也因此而推迟；2008 年下半年到 2009 年全年，通过进行财政和货币刺激，旧的增长模式得以暂时增强。2010 年开始的经济增长让中国重拾信心，为深入讨论改革大计、形成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早期共识创造了条件。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 ~ 2015 年）中，可以发现增长新模式的各种构成要素。

2012 年以来，改革继续深入前行，且更有针对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决定加大改革的力度、深度和广度。中国在改革金融和劳动力市场领域、融入国际经济、利用财政政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高级官员进行反腐败调查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上述部分政策已经使中国经济运行的统计数据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构成复杂的经济体来讲，某些变化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增长已如预期有所放缓，年增长率从 1992 ~ 2011 年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旧模式的 10% 下降到 2012 年时的 7% ~ 8%，经济增长出现了由超高速增长向增长新常态的转型。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开始，但巨大投资在支出方面所占份额在目前已经有所遏制。维持巨大投资与放缓经济增速意味着生产力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要把增长率维持在 7% ~ 8%，则必须通过改革，扭转生产率下降趋势。内需如期扩大，但来自

消费增长的内需扩大比重不高；工人工资和农民收入增长迅速，对缩小城乡差距有所贡献，但迄今收效甚微；如期实现了在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上的减排要求，对环境产生的有害排放显著减少。在环境方面，中国已经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挑战都堪称巨大，使得它在 2015 年制定减少煤炭使用、降低能源消耗策略时必须有更宏伟的目标。

现在，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更有必要进行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改革应当涵盖财政、劳动力、土地市场、公共财政制度和中国与国际经济的关系等诸多领域。本书带领读者领略中国最近在改革和结构调整方面的诸多进步，从整体上和诸多局部领域领会调整对经济表现的相互关系，提请注意中国政府在推动向经济增长新模式转变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些改革技术复杂，需要政府顾问提供大量相关信息和参考意见，需要领导人具备领导才能和政治判断力。唯有如此，才能规避诸多风险，实现稳定增长。相反，如果经济表现较差，这些风险将会破坏政治稳定。

除中国外，许多其他国家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都陷入了困境。过去三十五年来，中国推进改革和经济现代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因而在转型时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如此，由于这一转型任务十分艰巨，认为中国向发达经济体转型会一帆风顺的任何假设都是不明智的。

一些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分析家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新一轮改革，认为中国面临诸多挑战。他们的这些独到见解将在本文中得到呈现。在之后的各篇文章中，笔者将分析中国进入改革和增长攻坚阶段时的独有优势，将讨论改革可能给中国带来经济下行和震荡的不利之处。读者可以借此发现中国经济取得早期成功和存在潜在问题的各种表象。

不过，我们首先应当了解的是，新一轮改革和向发达经济体转型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顺应中国经济史的发展潮流的。

二 历史长河中的改革时代

与 1978 年以前的数十年相比，我们只知道，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日益发展壮大。

古代中国是世界文明的早期发展中心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时期，首都长安（今西安）就在城市面积、人口数量、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方面与同时代位于亚欧大陆西部的罗马帝国并驾齐驱。汉朝历时四个多世纪，在政治上比罗马更为成功，在内忧外患的不断侵扰之下能够迅速恢复元气。远离战乱和政治统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逐渐积累和缓慢提高，人口增长消化了生产的周期性增长，因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人均收入增幅不大。这就是传统的增长方式——一个直到 18 世纪晚期以前，全球文明都遵循的增长方式。技术、商业和管理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古代中国在这几方面都贡献巨大，但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从而进入生产率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1700 ~ 1820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0.85%，因而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增长都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所吞噬。人口增长率与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增长率并不同步。

在那些日子里，中国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在和平与繁荣的古代世界并非异常。18 世纪晚期，在欧亚大陆西端的一些近海岛屿上发生了极不寻常的事情。英国确立了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使其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同时发生。让早期经济学家感到惊奇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反而下降了，因此能够维持并加快生活水平的可持续增长。如今，我们认识到这些发展变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开端。

1820 年起，法国大革命、欧洲的革命以及拿破仑战争将欧洲大陆的旧秩序连根拔起，使得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得以扩展到西欧大部分地区。1820 ~ 1952 年，除了 1914 ~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39 ~ 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外，欧洲在其余时间里大都处于和平状态。在这期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 1.71%，人均产值年均增长 1.03%。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游离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之外，经济年增长仅有 0.22%，人均产值年均增长则下降到 0.08%。

经济增长速度上的细微差距叠加一个多世纪后，中西之间在经济规模和战略力量方面出现了巨大鸿沟：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 1820 年的 1/3 下降到 1952 年的不足 5%。

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起源于西欧。实现这一增长需要若干前提条件。中国在这一模式扎根于西欧时已经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现代化制度方面非常成功，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增

长模式的后来者。拥抱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意味着需要进行颠覆性变革。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有着业已确立并成功运行的政体制度。它们接纳现代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清楚地表明：可选路径就是进行颠覆性变革，这种变革一般是外来侵扰所迫，也有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致使战略力量增强的外来征服者所致。历史上，日本的政治精英们曾经达成一个长期共识，即与 19 世纪 70 年代外国入侵所产生的破坏作用相比，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颠覆性后果并不严重。75 年后，中国政治精英才形成了类似共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明确表示要践行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历史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采取了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按常规方式衡量，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主要得益于产值中转为投资部分所占比重的大幅增加。1949 ~ 1978 年，按照某些指标衡量，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6% 左右。不过，这种增长的性质使得该统计数字不能准确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过分集中于工业领域的基本建设，尤其是过分集中于重工业。在资源分配方面缺乏市场调节，国际交换规模很小，生产效率少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少有改善。中国与最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1978 年，中国决定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根据郅若素等学者（Garnaut et al., 2013）的描述，1984 年前为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以农村为重点，以增强经济活力为中心；1985 年起，中国开始对城市经济进行改革，改革的对象包括中央计划体制，改革开始时，其思路并不清晰，但随后的发展及所带来的成果却具有决定意义；1992 年起，中国迎来了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的长期经济增长；经过有政府背景的经济实体之手，中国实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不仅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1997 ~ 1998 年）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使其经济增长在 21 世纪初更加依赖巨额资本投入、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

改革使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联产承包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在人民公社的废墟上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充满活力。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经济；21 世纪初期，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第一出口大国、第一大贸易经济体，在储蓄率领先全球的同时，中国还成了全球最大债权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据世界银行估计，根

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参见《金融时报》，2014），中国将在 2015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企业所有权多元化后，要求进行复杂的制度创新，以确保对市场经济扩张进行有效规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大多数中国人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中国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

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一增长不仅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城市经济所占比重和高速增长的投资额方面，也体现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方面。中国在这期间取得的长期经济增长前所未有。根据 1990 年吉尔里 - 哈米斯元（Geary Khamis dollar）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在 1995 年时人均产值已经达到 2000 美元。自那以后的十六年间，这一数字翻了两番，达到 8000 美元。与其他所有国家相比，中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这一里程碑式的跨越（见表 1）。老牌发达国家为此耗时大约一个世纪；比较接近中国这一速度的是其东亚邻国，即韩国（历时 20 年）和日本（历时 17 年）。

表 1 现代国家人均 GDP（以 2000 美元为基点）翻两番所需时间表

现代国家或地区名称	人均 GDP 达到 2000 美元年份	人均 GDP 达到 8000 美元年份	人均 GDP 翻两番所需时间(年)	在此期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荷 兰	1827	1960	133	1.0
英 国	1839	1957	118	1.2
澳大利亚	1848	1955	107	1.3
美 国	1860	1941	81	1.7
法 国	1869	1962	93	1.5
德 国	1874	1962	88	1.6
墨 西 哥	1950	2008	58	2.4
香 港	1950	1977	27	5.3
新 加 坡	1950	1979	29	4.9
日 本	1951	1968	17	8.5
土 耳 其	1955	2007	52	2.7
台 湾	1965	1985	20	7.2
韩 国	1969	1989	20	7.2
马来西亚	1969	2002	33	4.3
泰 国	1976	2005	29	4.9
中 国	1995	2011	16	9.1
备忘项目				
全 球	1950	2004	54	2.6

三 经济增长放缓和未来增长新源泉

2011 年以前的改革年代中，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依靠海量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旧模式中获得了巨大好处。正如郅若素等（Garnaut et al., 2013）指出的那样，旧的增长模式成功后，该模式下一些要素，如 2005 年以来出现的劳动力日益短缺和实际工资不断上升的积极作用逐渐弱化（Garnaut, 2010; Cai, 2014）。随着收入的日益提高，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的继续扩大、消费增长的放缓、对消费可选择性的不必要限制、公款消费的日渐高涨、本地和全球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人认为，增长旧模式的副作用越来越不可接受。其他一些副作用，如出口顺差继续扩大、房地产泡沫居高不下、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失控，也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这些问题中，多数问题都是在改革中累积而成的，与市场导向的发展方式并无内在联系。相反，这些问题表明，市场机构和市场监管，特别是与要素市场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监管，没有到位。

在经济增长新模式下深化改革，是通过现代经济转型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中国劳动力在人口总数中比重的绝对下降，劳动力供给数量由增转减，使得这项改革更具紧迫性。“人口红利”消失后，资源的高效分配对生产率增长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分配对于促进生活水平的持续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新模式之下，资本积累的速度将会放缓，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重要地位将得到提升。但是，持续不断地提高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赖于该国要素的合理及有效配置，从而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的发生，而这又取决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经不可避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开始步入短缺阶段，存量资本增速放缓并被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部分抵消；或者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中国生产率增长已经进入下行轨道。在极端情况下，后者可能会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王庆等（Wang et al., 2010）指出，一个国家在其人均 GDP（根据 1990 年吉尔里-哈米斯元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达到 7000 美元时，人均 GDP 平均增速将显著下降。Maddison（2006）的数据显示，在人均 GDP 达到 7000 美元之后，40 个经济体中，有 31 个经济体都出现了增速下降。在人均 GDP 达

到 7000 美元之后的十年里，平均经济增速下降 2.8 个百分点。

中国在 2008 年迎来了它的增长拐点。当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出口需求增速下降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面临下行压力。危机爆发后，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就业与收入双增长，但仅仅暂时掩盖了从根本上提高生产率的改革呼声（Cai, 2012）。如今，坦然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成为践行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新常态。

四 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改革内容

中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一种强烈共识，即需要进行广泛改革，建立经济增长新模式。既定的改革方向就是重新调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在人口红利消失和存量资本增速下降的预期下，中国领导人决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为了增强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中国政府已经宣布采取多种措施，包括放松独生子女政策；允许农民工成为城市常住人口，以提高城市劳动人口数量，使其在城市工作早期积累的技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Song et al., 2010）；加大教育发展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居民和农民工孩子教育的支持力度，以提高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市场改革与社会保障、卫生保健和教育服务的改革紧密相连。这些改革，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至关重要。

其他方面的改革重点是完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以便更加高效地分配资本，并降低金融风险。这些改革，与机构改革紧密相连，旨在为民营企业松绑，促使国有企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来说，其财政必须受到更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避免地方债务的过度膨胀，以免不断上升的地方债务破坏金融稳定。需要有效发挥土地市场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缓解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中国还制定了涵盖领域广泛的改革计划，以提高法制运行状况，进行要素市场改革，提高市场监管质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制度变迁与发展过程，是一个在本质上必须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Perkins, 2013）。

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将中国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